

研究議題討論

社會建構論、批判實在論與行動者 網絡理論觀點下的身體與社會： 以肥胖議題為例

鄭斐文

鄭斐文 東海大學社會系助理教授。本文曾於STS年會會議中發表，感謝林崇熙、雷祥麟、苑舉正、王文基、林文源等人對於初稿的寶貴意見。感謝兩位匿名評審與編輯委員的修改建議。文章的任何缺失，由作者負責。

收稿日期：2013/1/25，接受刊登：2013/09/25。

中文摘要

本文以「肥胖（症）」議題為具體的現象，進而考察社會建構論、批判實在論與ANT三種取向，在身體與社會的關係、存有論觀點問題上的差異。本文以Crossley於2004年發表的〈肥胖是一個社會學議題〉文章作為批判實在論的肥胖研究代表，分析此文所提的「肥胖是社會事實」、「能量比科學」問題，並從社會建構論取向進行兩派的分析。辯論指出，批判實在論將肥胖症與能量比視為獨立於社會文化之外的「生物事實」，而社會建構論卻直指了「肥胖作為疾病」本身牽涉到特定社會群體的利益與醫療化的結果。社會建構論的問題，是將文化、論述（或語言）視為真正的「行動者」；批判實在論卻容易忽略身體與科學知識之社會建構性。本文最後以ANT的視角指出，「能量比的科學」與「肥胖身體」，應該於知識生產脈絡與行動者的異質網絡中進行檢視。肥胖身體是透過促成、展演而轉為「事實」與特定的存有。本文最後指出，三種取向的比較分析讓我們看到更多異質知識與政治介入的可能性。

關鍵詞：肥胖 / 肥胖症、社會建構論、批判實在論、行動者網絡理論、身體 / 自然與社會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of Social Constructionism,
Critical Realism and Actor-Network Theory on Body and Society:
A Case Study of Fatness/Obesity**

Fei-wen CHENG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Tung-Hai University

Abstract

By exploring the sociological issue of fatness/obesity, the author compares three different approaches—social constructionism, critical realism, and actor-network theory (ANT)—to analyze relationships and ontological differences between body and society. Crossley’s (2004) article, “Fat Is a Sociological Issue,” is analyzed in terms of the concept of *energy ratios* and ‘obesity as a social fact.’ It is argued that critical realism locates obese bodies and *energy ratios* as biological facts existing outside of socio-cultural contexts. In contrast, social constructionists approach obesity as a medical issue, an approach that is criticized as an example of a discourse replacing the actor. However, the realists’ approach is also criticized as ignoring the construction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Based on the ANT ontology, I argue that the concept of *energy ratio* should be reexamined in terms of knowledge production and heterogeneous networks. I conclude that analyses involving the three approaches provide greater space for heterogeneous knowledge and socio-political interventions.

Keywords: Fatness/Obesity, Social Constructionism, Critical Realism, Actor-Network Theory (ANT), Body/Nature Versus Society

一、前言

在當代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中，關於「身體」的問題已累積了豐富的研究，領域包括了女性主義身體理論、文化研究、科技與社會（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以下簡稱STS）等。一般說來，它們皆觸及或企圖挑戰18世紀以來的生物決定論，以及自然與社會二元對立的觀點。特別是在傅柯取向的（Foucauldian）視角影響下，原先屬於生物範疇的「身體」，被認為是社會論述建構的場域，是生物醫學、流行病學或相關的科學知識，在特定的社會情境與實作中建構的（尤其是「性別／種族的」）存在。

在身體與社會的相關研究中，厭食／暴食、減重、塑身是很重要的主題。當代社會中大量的節食、減重、瘦身、健身美容與特定食品消費的實作出現，以及相伴隨的「健康」身體的論述，是現代人自我認同的重要組成，以Giddens的話來說，是現代性反思計畫的一部分（Giddens 1991: 92-101）。從性別政治的角度出發，女性主義者則針對女性肥胖身體、厭食與瘦身議題進行研究（Orbach 1978; Chernin 1981; Bordo 1995）。以厭食症為例，Bordo就認為厭食症並非「醫療案例」，而是父權社會文化的產物。女性主義者質疑了自然／文化、身體／社會的二元對立關係，並進而分析「自然」範疇的社會建構性。1990年代以後，更有稱為「批判的肥胖研究」（Critical obesity research）或「肥胖研究」（Fat studies）取徑出現，他們認為「肥胖不能被界定為單純、無問題的生物醫學範疇、疾病或病因學，而是一種社會性的建構與具爭議的『問題』」（Evans and Colls 2009; Campos 2004; Gard and Wright 2005）。他們直接分析醫學論述本身，特別是介入流行病學的醫學知識與「科學事實」的問題，並指出肥胖作為一種需要強力醫療介入的「疾

病」這件事，本身就是一個醫療化的效果（Sobal 1995）。以此角度觀之，當代身體已成爲醫學、科技與各類專家知識不斷介入、銘刻、書寫、形塑的領域，從而轉變了身體的形狀與功能。以Foucault（1982）的話來說，這可稱爲現代性的「身體技術」（technologies of body）或者「身體計畫」（body project）。

無論如何，1980年代以後這類議題也在社會學領域裡引起了衆多討論，而上述這些說法一般被歸類爲是所謂的「社會建構論」取向。¹而針對這類取向，1980年代一群「身體社會學」的學者（如Crossley、Shilling、Turner、Woodward、Williams等）有不同的看法，他們一方面挑戰生物決定論式的化約主義，另一方面也批評了所謂「社會建構論」傾向於將自然與身體，化約爲文化、論述與語言形構的產物，是以「社會化約論」取代了「生物化約論」（Williams and Bendelow 1998: 128; Newton 2007: 20; Woodward 2004）。在這些身體社會學者中，醫療社會學家Williams等人援引英國的批判實在論學者Bhaskar、Sayer等人的觀點，並且自稱爲「物質—肉體實在論」（material corporeal realism），強調要重新將生物與身體物質（corporeality）帶回到社會科學中（Williams 2003; Williams, Birke and Bendelow 2003）。

針對此，社會建構論者則反駁說他們並非忽視自然與物質的存在，而是要強調存在本身的社會建構性（Newton 2007: 21-4），以及這些建

¹ 「社會建構論」一詞涵蓋很廣，與批判實在論的歷史學、社會學、哲學家有很多辯論」（Sismondo 2007: 92）。其實社會建構論有很多不同的主張，其中有些反實在論，有些並非如此。兩派主要的爭論仍然在於，物質世界是否有一獨立實存、在言說之外的經驗或「自然」。這個辯論也牽涉到認識論、存有論與政治性問題。無論如何，以下的討論採取比較廣義的看法：亦即認爲自然本身具有社會建構性，非一獨立於社會文化語言之外的存在。

構性的論述效果。以性別政治為例，社會規範建構下的「理想身體」使得偏差 / 不正常的身體被污名化，而女性正是在父權社會的性別身體規範下，服從了特定的「瘦」的身體美學、道德與自我認同。由此來看，批判實在論與社會建構論之間的論辯包含了幾個不同的層次：首先是在於認識論層次上，辯論有無獨立於社會文化語言之外的「自然」存在；再者，則關聯到特定議題的分析手法與觀點，例如：如何分析「肥胖症」或「厭食症」；最後，則牽涉到由各自認識論與分析觀點出發所得到的結論中所隱含的政治問題。

本文將以這兩派取向之間的差異為主軸，以性別政治與身體社會學的關懷點「肥胖」議題為具體的切入點，考察社會建構論與批判實在論的理論差異、分析觀點與學術 / 政治性。再者，我將從行動者網絡理論與「物質—符號學」（Actor-Network Theory and material-semiotics，以下簡稱ANT）的理論角度，探討「生物vs.社會」兩者的關係與認識論問題。選擇ANT與批判實在論、社會建構論進行對話，是因為它的核心觀點恰好在於認識論與存有論的觀點上直指「生物與社會」二元對立的不當。簡言之，它認為生物與社會關係是互相構成，所有行動者都沒有預先確定的本質，而是鑲嵌在異質網絡中萌生的，而這個網絡包括了人與非人的行動者等（機器、自然、動物、制度等）（吳嘉苓 2009；林文源 2012；陳瑞麟 2010）。由於ANT在認識論 / 存有論概念上直接挑戰了批判實在論與社會建構論，因此在分析自然身體與社會的關係上，可以提供更深刻的看法，也更可以看出不同的知識 / 政治的抵抗意義。

在具體的切入點「肥胖議題」上，身體社會學者Nick Crossley曾於2004年的一篇文章〈肥胖是一個社會學議題：晚期現代、「身體—意識」社會的肥胖率〉中，以批判實在論角度指出當代與肥胖研究有關的社會建構取徑，包括Giddens的身體計畫說、傅柯與女性主義身體研

究、厭食作為抵抗父權與無意識（unconsciousness）說法，都無法解釋肥胖比例升高的社會事實問題：肥胖比例升高並不符合社會建構論中對於論述／身體高度控制的「預測」。不僅如此，他更直接質疑了社會建構論在認識論與存有論層次上的諸多問題。由於Crossley的文章批判了1980年代以來建構論取向的身體與肥胖研究（包括厭食症為例的女性主義理論），並且是唯一一位以批判實在論的觀點進入此經驗研究領域的社會學者，更是直接的在肥胖議題上對抗著社會建構論；因此，本文選擇Crossley文章作為討論的起點，然後逐漸延伸出批判實在論與社會建構論在認識論與存有論上不同取徑的比較。

以下第一節將簡短介紹批判實在論的基本看法，然後討論Crossley的〈肥胖是社會學議題〉與其如何在肥胖議題上批判社會建構論的觀點。第二節則將帶入社會建構論式的「批判肥胖」研究，探討肥胖身體如何在醫療化趨勢下，成為病理學的凝視對象，並且論及肥胖科學的核心說法「能量比」，藉此與批判實在論對話。而第三節將從認識論與存有論層次，比較社會建構論、批判實在論的「物質—肉身」取向，與屬於「物質—符號學」的行動者網絡理論之間的差異，藉此分析此三種不同取向解釋生物／自然與社會的觀點，以及釐清此三種理論取徑觀點的辯論。在結論之處，我將粗淺的評價這三路觀點的知識／政治意義。

二、「肥胖是社會學議題」：批判實在論的觀點

批判實在論起源於Roy Bhaskar的理論，也可以稱為「形上學實在論」或「超驗實在論」。雖說是一種哲學理論，但是被廣泛應用在社會科學的階級議題（Sayer 2000），而近年來批判實在論學者如Williams與Birke等人也將分析架構放在醫療社會學與身體研究，也稱

為「物質—肉體觀點」或具體化的實在論（material corporeal realism or corporealist）。根據Williams與Baert等人的解釋，批判實在論強調世界的真實是獨立於人類概念之外，包括事件發生的層次（the actual）、經驗的層次（the empirical）與深層結構的層次（the real）等都是（Williams 2003: 51-2; Baert 2011: 127-32），因此研究者最重要的任務便是努力趨近真實。

批判實在論會認為，社會建構論者經常將生物性的身體化約為論述或語言的範疇，忽略了生物／物質性、以及施為者主觀經驗與抵抗（Shilling 2003; Turner 2010; Williams 2006）。Williams（2006）就指出，身體與疾病若以論述建構的角度來分析，則僅會強調事物「如何」建構，而無法回答「建構『什麼』」的問題。代表這一派的女性主義生物學者Birke則以強烈的語氣批評傅柯與「後現代派」已經「去身體化」（disembodied）或「去物質化」（dematerialized）了。批判實在論的社會學者強調，身體是一種動態、活生生的具體化經驗（embodied experience），必須將身體／生物學／肉體重新帶回到「身體社會學」（embodied sociology）的考察中，也才能有施為者（agent）的分析空間（Williams, Birke and Bendelow 2003; Monaghan 2008; Turner 2010）。

就如同Williams與Crossley指出的，雖然社會學者反對傳統生物決定論，卻瞭解到人們對於世界的理解是建立在生物／自然的互動與人類扮演的角色上。歸根究柢來看，人類雖有很多部分的溝通是屬於社會的，但也有生物性與「前語言性」的部分不可被化約。Crossley在〈肉身與溝通的行動〉（Corporeality and communicative action: embodying the renewal of critical theory）文章中就強調：

出生後24分鐘的嬰兒就會對成人吐舌頭的動作進行模仿——在他們還沒有瞭解到「舌頭」的概念，或有時間瞭解他們與他們的父母有舌頭。（Crossley 1997: 28）

亦即，人類社會有一種前語言（pre-linguistic）生物本質，是人類學習與社會表現的基礎。準此，Crossley質疑社會建構論過於注重論述，忽視了「先存的與基本的互為肉身性（intercorporeality）」支配了社會化過程（Newton 2007: 5）。因此批判實在論也強調社會學者要與生物學進行對話，並且呼籲正視「自然」作為人類社會基礎的理由。

根據「真實獨立於語言之外」這一基本存有論原則，批判實在論批判社會建構論者完全混淆了認識論與存有論之間的差別。Crossley指出：

建構過程對應到基礎的真實（underlying realities），以及建構過程是科學分析中必要的基本的步驟（Sayer 2000; Bachelard 1970）。它們不能先行包含分析。如果不是如此，就是混淆了認識論與存有論的問題（Bhaskar 1979; Sayer 2000）。……我認為社會學太經常選擇建構論的路徑，有效地從重要的辯論中撤出，並且將實質議題地基礎讓位給其他科學。我們停止去嘗試解釋現象，卻選擇去「解構」他人的意圖，因此廉價地讓渡了我們自己學科的解釋潛力，並且邊緣化我們自己。（Crossley 2004: 230）

換言之，批判實在論認為必須區別清楚存有論與認識論之間的邊界，而建構論混淆了（現象世界客觀存有之）「事實」與（科學研究所建

構出的分析)「方法」之間的差別(Williams 2003: 51; Baert 2011: 127)。若以肥胖議題為例, Crossley (2004) 就認為, 社會學首先必須面對科學的經驗資料與統計的證據, 承認「肥胖比例的增加是一社會事實」而非是一種「建構」。他指出, 近20年來肥胖症比率不斷升高是個不容否認的「社會事實」, 而此事實是現代生活方式中「生理與社會」交互作用的結果。而當許多主流的學術, 包括心理學、基因科學等領域對此議題諸多討論時, 社會學界的解釋卻依然付之闕如, 完全無法回應當前的狀況。

Crossley批判道, 既有的社會科學解釋包括女性主義者、身體社會學、文化研究等取向, 不是將肥胖關聯到「自我管理/控制作為一種現代性的反思計畫」(Giddens 1991)或現代性的「身體計畫」(Foucault 1982)、便是將肥胖與厭食症當做一種「抵抗父權的(潛意識)」(Orbach 1978)。簡言之, 是把現代的身體/主體置放於權力與論述機制架構下進行考察。但如果現代社會具有如此高度的身體一意識(body-conscious), 自我監控的論述與實踐占了支配的地位, 減重運動又是如此盛行, 那為何肥胖比率仍不斷升高? 他說:

我想要將肥胖症比例不斷升高的意義, 放在社會學所關注的身體—社會的關係下來思考, 社會學描述的「身體—意識」社會是讚美瘦、健康與減重, 在這種社會下的成員會根據這些「身體—意識」的理念而監控與調整自己的行為。社會學的描述必須與肥胖症升高的事實一致。到底為何在一個社會等同於身體意識、並且據說是如此關心瘦身的社會, 卻仍有肥胖症危機?

(Crossley 2004: 223)

他因此認為，社會建構論中把身體與主體放在權力與論述中理解的取徑並非是「實質」(substantive)的分析。所謂實質的分析必須是把討論拉到生物與社會如何互動的層次，而肥胖人口增加(也就是非自願性的肥胖)的原因，根本上是生物—社會過程(bio-social)互動的結果；也就是說「肥胖症」是社會與身體相互作用後所產生的疾病，而非只是所謂的「社會建構」而已。但如何分析這個互動呢？

Crossley首先將肥胖理解為一種生物學機制(biological mechanism)，並且提出了能量進/出比率的概念(energy ratio)。所謂能量進/出比率，是指個人身體重量增加或減少可用食物攝取/熱量吸收與消耗的比例來解釋。而身體熱量消耗過少的主因，則來自於晚期現代社會的生活方式(lifestyle in late modernity)，例如：使用汽車、少運動、不自覺的飲食失調、外食……等。換句話說，是社會的問題導致身體的病態，兩者互動的結果，導致了「個人生物學上的能量比」變化，從而出現了肥胖。

不過，生物/自然身體與社會的關係(biology-society relationship)，基本上是不可相互化約的。Crossley從象徵互動論的角度指出社會、施為者(agent)與生物有機體的互動關係：

肥胖症，在一個層次上，是肉體生理事實，也是生物學機制的效果：能量比率。然而，本文顯示了，首先，肥胖症在社會或社會團體的比例是一種社會事實；第二，比例的提高會有其社會原因，至少至今它們反映了社會變遷；第三，這些改變又反過來影響社會。隨著這些更進一步在社會上存在的因素，特別也增加了疾病與早期死亡的比例。可以說，是這種社會威脅加速了政府對於肥胖症危機的反應。要爭論這個案例我們必須去

更詳細地思考關於生物學與社會過程的詮釋。特別的是我已經試圖反思由社會互動組成的社會，總是同時的是生物學上的能量交換。社會、施為者、與生物有機體每一個都是互動的過程網絡（processual networks of interaction），但是他們也以各種不同方式重疊與相互滲透，形成一個更大的互動過程網絡。肥胖症同時是此網絡的互動過程的效果，並且在裡面啟動更多重的行動與反應。（Crossley 2004: 250；黑體字為作者強調）

更細緻的來看，Crossley指出身體的生物機制是所謂「低度層次」，受到「高度層次」社會的影響，而生物存在本身也是一個「互動之處」：

要完全瞭解這一點我們必須認知到身體，作為生物學的有機體，也是一個互動的地方，同時是屬於內在（組成的元素之間）與外在（在這些元素之間、元素所形成的整體與皮膚範圍外的肉體世界）……社會互動決定了能量的進與出的層次，但也同時依賴著能量保存與一種能量進一出的平衡。所以如果我們不吃足夠的「對的東西」以及以其他方法保留熱量（例如透過睡眠）我們會發生一種狀況，就是缺乏必要地能量來行動及／或者無法有適當的功能。類似的，如果我們吃太多「不好的東西」及／或變得太不活躍，能量層次累積到以一種肥胖的形式存在，他們會累積到我們生病的程度，且／或者我們的社會行動能力會被負面的影響：那就是肥胖症。（Crossley 2004: 245、254；黑體字為作者強調）

亦即，社會互動決定了身體能量交換，能量是從環境輸入，從行動與內在器官的功能運作中消耗。肥胖疾病可說是社會層次影響生物身體的平衡所致。由此可以看到，一方面，「社會互動有其生物學上的先決條件與效果」，的確意味著社會的影響建立在生物條件上；然則，另一方面，它也指出了社會作為「高度」的層次，關鍵性的決定了「低度」的生物層次。而且這個影響非常細緻的在肉體之內發生。

總結來說，Crossley基本上代表了象徵互動論學派的身體社會學，與批判的實在論（critical realism）的觀點，他強調了：（1）生物學身體與社會之間的存有論的不可化約性，以及兩者的互動關係。（2）肥胖症是基礎在生物事實的「能量比」律則與運作結果；（3）肥胖症不是社會「建構」的疾病，而是受社會影響的結果（effect），是一種社會變遷下的疾病與危機。（4）社會施為者（agent）因受到生活方式的影響，而不自覺的成為肥胖者，卻又因肥胖身體與社會規範下的理想身體相抵觸，因此個人會感到不安，產生「社會緊張」（social strain）。因此，去塑身減重、或以「自然化」角度解釋肥胖來自於遺傳的說法、反肥胖歧視運動的產生等等，都是社會緊張與肥胖增加的事實中，施為者「生病角色」的反應。

從他的角度再回過頭看所謂「現代性的身體計畫」（減重等當代實踐），並非是所謂「身體—意識社會」所建構的身體實踐。他認為減重是因為肥胖造成不舒適的身體經驗，導致施為者對於自己身體與所處的社會產生「反應」。這一點上，完全對立於建構論者的看法：

在20世紀的最後25年，大部分的人們會開始運動與減重不是因為「自戀」、「存有學上的不安全感」或者「生命權力」本身，如許多研究所指出的（eg. Giddens 1991; Shilling 1993;

Foucault 1980a; Bartky 1990; Lasch 1979)，而是對此時期特有的生活方式變遷所產生的、非自願的體重增加的反應。
(Crossley 2004: 248)

所以，肥胖當然是個社會學的議題，是討論當代社會生活與社會變遷的關鍵問題。而根據他的結論，又該如何改變作為一種非自願性體重增加的社會事實——「肥胖症」呢？他說：

人們會發展一種習慣……他們總是慣性的、系統地將重量增加的想法從心中趕出去，而沒有察覺到他們正在做這些事。從這方面來說，肥胖症，……有其潛意識方面的面向……。
(Crossley 2004: 224)

準此，在「對抗潛意識」這個面向上，他強調了個人需要更為小心的計算能量（卡路里）的輸出與輸入。由此，他的政治結論似乎把責任（或希望）放在個人之「自覺」，以不斷自我監控的方式來改變這個社會現象。

簡介了批判實在論在存有論與認識論層次上的觀點、它如何在經驗研究的層次上分析肥胖，以及它所提出的解決方案之後；下一節，本文將從建構論式的「批判的肥胖研究」角度，探討（生物）醫療化與肥胖流行病學「建構」下的社會與生物「事實」，以及對於批判實在論的「政治質疑」。

三、醫療化與能量比：社會事實或生物事實？

從建構論的立場出發，批判的肥胖研究經常質疑肥胖科學的研究倫理與政治性（Monaghan 2008: 6; Evans and Colls 2009; Gard and Wright 2005; Oliver 2006; Rich and Evans 2005; Ross 2005；許甘霖、王思欣 2006；鄭斐文 2012），而此質疑首先是針對肥胖的「科學」統計數字。Monaghan在〈男人與肥胖症的戰爭〉一書中指出，Crossley的「肥胖是社會學議題」呼聲的確重要，但他對肥胖統計的引用僅止於表面意義的理解，缺乏深探肥胖升高統計背後的意義詮釋（Monaghan 2008: 8）。亦即，肥胖的流行病學知識，經常在公共衛生的領域中同步了社會「瘦／健康／正常／積極」與「胖／疾病／不正常／懶惰」的想像，並且用所謂的「科學數據」強化了社會對於特定人群的「道德判斷」，如果我們輕易使用了特定的統計資料，很容易便落入這些數字背後既存的預設（Peterson and Lupton 1996: 27-60; Gaesser 2002; Monaghan 2008: 69; Crawford 1994）。由此角度來看，肥胖恐怕不是作為「疾病」或「社會事實」的存在，而是一種「意識型態」了。

與Monaghan「解構科學數據背後的意識型態」的批評類似，建構論者大致會去質問：主流肥胖論述中呈現的「社會事實」，其背後牽涉到的是什麼樣的機構知識（institutional knowledge）生產與實作（practices）？本節將從1990年代興起的批判的肥胖研究觀點，對「肥胖流行病」進行分析。以下大概可分為兩個不同的層次：（1）關聯到肥胖「如何成為『疾病』」的社會分析，即所謂「（生物）醫療化」的問題。（2）肥胖本身「如何成為『事實』」的科學知識問題，在此案例中便是「能量比率科學模型」本身如何可能的問題。換言之，社會建構論觀點主要藉由檢視醫學知識內部的建構與政治性，並「揭示醫學理

性與實作的歷史偶然性，以否定生物醫學自我宣稱的線性進步積累與開展」（林文源 2006: 75）。以下先針對「肥胖如何成爲疾病」進行討論。

（一）醫療化：命名、指標與社會權力集團

一般來說醫療社會學者認爲，「醫療化」指的是醫學範圍的擴張過程，將本來屬於社會、文化、道德或法律的領域的問題，定義爲醫療問題（Clarke and Olesen 1999; Clarke et al. 2010；吳嘉苓 1999）。根據批判的肥胖研究，肥胖者被視爲不健康的群體，在歷史上很早就出現了（Gilman 2004; Schwartz 1986），但近代醫學的特殊性便在於：將身體尺寸歧視大規模的納入醫學知識與組織中，成爲研究與治療的對象（Monaghan 2008: 3; Sobal 1995）。

此過程的面向之一便是關於肥胖語彙的概念轉變。根據Sobal（1995）的科學知識轉型研究，obesity一詞在大眾文化的流行與傳播，在美國主要與肥胖醫療化的趨勢有關，約從1950年代開始，美國社會討論肥胖的普遍用語從「發福」（corpulence）轉成1970年代大量使用的「肥胖症」（obesity），而其身體的意涵也從早期語彙中內在的道德論述——壞的（badness）、「胖豬」等貶抑語言，轉化爲「疾病指稱」（medical term）——肥胖症、過重、動物性脂肪、肥胖基因等醫療專業用語（Sobal 1995: 68-71）。到了1990年代，肥胖則正式被命名爲「慢性病」與「流行病」。此種「命名」的過程，同時也是相關醫療組織活動浮現（肥胖醫療社群，如專業的臨床者的出現）、特定技術的發展（如手術的運用）、以及陳述機構（如醫學期刊、大眾媒體）出現的醫療化過程。Oliver的研究則指出，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

(CDC,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本來關注的議題是瘧疾、天花或者AIDS而非肥胖症，卻於1997年起開始與科學家合作做出一系列肥胖人口比例的系列圖表，以美國地圖來呈現肥胖人口成長的趨勢。² Oliver批判，此種圖表的色彩視覺效果，不只是簡單的「趨勢」，而是「危急狀態已經在美國蔓延開來」（紅色代表危急）。雖然，很可能真正的狀況是，政治經濟條件（貧窮）才是真正的肥胖之因，然則在此類圖表卻顯示肥胖「從州到州」的「地理空間擴散」，類似病毒感染的傳播一般（Oliver 2006: 42）。無論肥胖研究與其再現如何不準確，它仍被主流社會定義為疾病。論者以為，這是因為牽涉到特定團體的利益。Oliver就分析了國際肥胖專案小組（IOTF, International Obesity Task Force）這個組織，其最早的任務便是去降低WHO設立的BMI標準。表面上IOTF是一個研究肥胖議題與政策的科學家組織，但其首席Philip James——作為一位營養科學家，臨床試驗研究的經費，主要來自於肥胖藥物羅氏纖（Xenical）與諾美婷（Meridia）大廠；於此，他也不斷給予羅氏藥廠（Hoffman-La Roche）的新產品正面評價（Oliver 2006: 28-9）。從這些例子可以看到，醫療化不僅指涉了許多概念的轉變，更重要的是，巨大的經濟力量支撐了這個轉變本身。

無論如何，上述對於社會建構論的「肥胖科學」之醫療化批判，一方面分析其命名與指標本身的不當與荒謬性，同時更指出這類命名與指標的變遷，其實關聯到特定的社會組織：減重藥廠、瘦身美容業、相關的研究組織、國家部門、各種醫學專業協會…等的利益。「社會團體之利益（interest）」這件事，也許不是「（生物）醫療化」概念內在的所有面向，但卻是其重要的組成。

² 這一系列的圖片請參見以下網址：<http://www.planning.dot.gov/Documents/Health/IntHealthTA.htm>（檢索日期：2012/4/6）。

(二) 機械論的「能量進/出」(energy-in/energy-out)： 典範、論述與文化

之前提到，Crossley的「能量比」模型是指身體運作的生物機制法則。然則，批評者認為此法則過度簡化了身體與社會文化關係的複雜性（Rich and Evans 2005: 348-9）。Gard與Wright（2005）就指出，雖然「吃過量導致肥胖」的說法似乎已被視為是不證自明的假設，但其實至今仍缺乏堅實的證據。Sobal與Stunkard（1989）檢驗肥胖科學研究中體重與能量攝取的實驗後指出，現今很多研究都是短時間的實驗室內研究結果，但若以長時期在實驗室外的方式，在田野研究上去監控食物攝取與能量消耗，能量攝取與身體重量之間，仍然是弱關連的（Sobal and Stunkard，引自Gard and Wright 2005: 41）。

類似的例子也出現在兒童肥胖、活動量與飲食的三者關係的研究上。Gard與Wright瀏覽主流科學文獻後指出，幾乎沒有證據可顯示兒童身體活動多寡與肥胖的因果關係。另外，以「運動之密集與強度—身體熱量消耗—肥胖」這一個關連為例，至今科學界仍然沒有確定一致的答案。原因在於，肥胖等於能量消耗減去能量吸收（ $a-b=c$ ），此類機械式的科學模型理論無法容納其它可能，包括文化差異、年齡、地區、社會等因素，都被排除在能量比概念之外，身體活動的複雜性都被過度簡化了。

若從社會建構論觀點來思考「能量比雖難以確定但仍被信服」的現象，也許可將此說法視為一種特定的「典範」或是一種論述，並將之放在特定的文化之中來看待；換句話說，不將此概念本身視為一種論述之外的「自然法則」，而視之為眾多論述的一種。因此，若針對能量比學說進行「考古學」分析，將有助於理解其意義在文化脈絡下的轉變。

能量比率的文獻最早可回溯至1906年。卡路里計算主要是從耶魯的經濟學家Irving Fisher開始。他除了把機械與化學的熱力學平衡律則與市場平衡的概念相對應之外，更把熱力學平衡模式，用來定義「營養」與身體能量。而將物理世界律則應用到人類社會（特別是經濟生產與軍事組織）與人身肉體之上，使其成為「可管理」的對象，是受到泰勒的科學管理主義的影響。³ 也是從1920年代開始，卡路里的能量計算開始與身體重量關連在一起。Schwartz分析這段歷史指出，事實上卡路里計算除了代表身體被以能量的單位來想像之外，也代表一種「文化要求」：任何重量之溢出（excess）皆是管理控制之失敗，而其後果也象徵了社會資源之浪費與經濟活動之無效率（Schwartz 1986）。

Chang與Christakis（2002）也曾經從歷史分析的角度討論美國肥胖醫學教科書的論述轉變。他們指出從1927年到2000年的80年間，肥胖原因的解釋大都是以「能量不平衡」為主要的理論模型（Chang and Christakis 2002: 154）。大約從1960年代開始，醫學教科書對於肥胖原因的探討，就逐漸出現了「環境」（或「社會」）因素的解釋。這可能是消費者與環保運動對食品工業、消費市場的批評所致，也是肥胖科學論述轉向「社會／環境」的社會基礎。所謂「社會／環境」，大致上包含了諸多相似的指涉：食品工業、生活風格、科技產品……等等「非個人」的範疇。這一路研究並非直接證明或否認能量比的存在，而是把能量比連結到外在的環境，譬如說以一種非常不精確的「生活方式說」作為肥胖的原因。事實上，西方公衛學術領域大約從1970年代開始，健康問題的討論就已經關連到「生活方式」了。所謂「生活方式」主要是指：現代生活方式中，如電視、電玩、電腦、汽車……等科技的使用，令人們減少了身體活動，導致了肥胖流行病的出現。這種說法也許反

³ Fisher自承，他在讀過泰勒的傳記後表示與其想法毫無差異。

映了西方社會普遍存在的「科技導致社會病態」（或「對科學不受人類控制之恐懼」）的觀念。⁴ 在此我們可看到，從建構論的角度來說，Crossley所言（生活方式變遷導致非自願性肥胖）符合主流社會對肥胖的解釋。

無論如何，Chang與Christakis的研究（2002）指出，雖然後期肥胖科學論述轉向強調「環境」對個人的影響，但主流肥胖論述並非真的關注社會結構問題，文化中普遍可見的倒是個別主體在瘦身工業社會的監控下，身體規訓技術（technologies of the self）以不同形式大量的出現。舉例來說，1970年代出現了肥胖的新型態療法——「行為治療」，強調行為與環境的影響，例如：邊看電視邊吃飯會吃太多；但重點不在於改變環境（整個社會對於電視著迷的消費文化），而是要「改變自己行為」來減重。

能量說典範到了1980年代中期以後，隨著生物科技基因典範出現，基因的作用成為討論的焦點。由於Ob基因（之突變）與瘦體蛋白的發現，1990年代後的肥胖科學論述轉為強調生物學與遺傳，體重因此被視為是基因與環境互動的結果（Shell 2004: 107-166; Vogel 2001）。然而，分子生物學所強調的環境與基因的互動，仍是生物學佔了支配的因素，環境只是因應基因而行的變項。雖然此「基因」典範逐漸強大，但卻意外的成為能量比計算模型的某種「補充」。1990年代開始，能量比逐漸與基因模式相整合，當能量進／出模型無法解釋肥胖原因時（例

⁴ 「生活方式說」經常假設了科技物品的電視與電腦等，會導致違反「傳統家庭價值」，與「不運動」，類似「邪惡的科技導致肥胖」的說法。雖然現代的科技的確有相當大的負面影響，但這些科技使用到底如何具體的影響了身體，並導致肥胖？是「科技」導致人們不運動，或是勞工工時過長所導致的疲勞、不動與飲食失調？這些在生活方式說中，較缺乏進一步的討論。

如，某人吃多運動少，卻仍未發胖，或相反時），基因就自動成爲解釋變項，成爲能量比模型中的「黑盒子」（Gard and Wright 2005: 72-3）。

綜上所述，若從肥胖科學的簡短演進來看，能量比並非一獨立存在的概念；作爲一種「科學典範」，它在不同歷史階段與不同典範既有差異也有關連。1960年代後，與生活方式說結合在一起，在「環境與個人互動的關係」中扮演著「個人端」的解釋（經常在論述效果上，強化了個人的責任）；而在1980年代後，基因說則補充了它所無法解釋的面向——雖然基因與能量說這兩類典範的關係尙未被真正釐清與證實。更進一步說，從典範變遷的角度來看，Crossley所謂能量比說法或背後所指涉的「生物機制」，也並非是先驗、去歷史的存在。

略微總結社會建構論對於肥胖議題的看法，可以看到其與批判實在論在存有論立場的根本差異。批判實在論將肥胖症與能量比視爲獨立於社會文化之外的「生物事實」，而社會建構論卻是在這一點上直指了「肥胖作爲疾病」本身牽涉到特定社會群體的利益，視爲是醫療化的結果；另外，能量比理論（作爲一種科學典範）則呼應了當代管理主義的思維。在存有論的意義上，建構論否認存在於社會語言文化之外的獨立存在；在認識論層次上，則藉諸多歷史、文化與社會因素來分析「事物如何可能」，呈現出事物的形成過程來消解其存在的本質性。最後，在肥胖議題中，建構論批判了醫療化並指出Crossley的「肥胖是一種社會事實」與「能量比概念」缺乏論述與權力的分析角度，導致其論述本身也成爲正當化利益結構的一部分。

由於批判實在論與社會建構論的觀點差異牽涉到文化／自然、身體與社會等二元關係的討論，因此，下一節我們將把討論關連到社會（結構）、文化（論述）、身體（生物）範疇的認識論層次上，並透過ANT的介入來觀照不同取徑之間的知識／政治議題。

四、身體與社會的存有論與認識論：從行動者網絡理論觀點看社會建構論與批判實在論

關於建構論以「呈現事物如何可能的過程，消解『自然』存在之客觀獨立性」，實在論的批評是：建構論拒絕以客觀主義的方式宣稱有「基礎」的存在，保持著全然的「不可知論」（agnosticism）的姿態，逃避了任何有意義的政治介入。不過，事實上多數的建構論者是所謂「弱建構論」（mild constructionism），經常曖昧的擺盪在「有實存」與「純然建構」之間（Newton 2007: 24）。

關於這一點，我們在上述討論建構論所提及的「醫療化」與「能量比」時，也多少可以察覺。亦即，當社會建構論在運用「醫療化」概念的同時，似乎也模糊的把歷史變遷的「動力」放在所謂「特定的利益團體」上，傾向於把這些利益團體當成是製造了「肥胖」的「行動者」。換言之，是「真實的」利益團體共謀實踐出「肥胖這個特定的假疾病」。再者，建構論對於典範變遷的提法，似乎暗示了某種文化氛圍或論述，影響或最終決定了「科學學說」（或那類學說能夠獲得社會的承認）。在此意義上，文化、論述（或語言）才是真正的「行動者」。譬如說，「科學管理」的文化氛圍讓機械論式的「能量比說」符應了整體社會的文化想像，社會或語言似乎也成爲另一種「存有」，取代了批判實在論存有論上的「自然」。

另一方面，批判實在論對於建構論者的批評也不是毫無正面回應：Crossley便警覺到自己缺乏對於「肥胖科學論述」的理解，在〈肥胖是一個社會學議題〉結論部分他便指出，未來需「更進一步……探討『肥胖症』的歷史作為一種科學概念，以及在社會中不同肥胖層次的監控的歷史……」（Crossley 2004: 250）。而他提到的「進一步考察」，

其實正是建構論者已經涉入多年的主題：對於知識 / 論述過程與效果的解構。Baert在這一點上很精準的批評了批判實在論對於知識習得（knowledge acquisition）與詮釋的觀點過於化約與缺乏脈絡的分析：

對於知識是什麼採取有限的觀點，部份是因為他們受制於「科學的」視角——我指的是一種觀點，在此觀點裡，某種特殊的自然科學模型籠罩著任何關於知識習得之本質的研究。（Baert 2011: 144）

但要如何一方面視身體為實存，另一方面又不落入「特殊的自然科學」視角把身體看成與論述全然無關的存在？批判實在論學者Williams認可ANT似乎在社會建構論與批判實在論之外，開啓了另一種可能性（Williams 2006: 19-22）。也就是，ANT強調身體的「實在」與「物質性存在」觀點，某種程度上解決了社會建構論的認識論缺失，但ANT的架構又能夠將論述與語言的力量同時帶進分析之中。本文認為，將ANT觀點與批判實在論、社會建構論放在一起比較，可以看到他們在思考身體與社會關係上的理論圖像。

作為STS中很重要的一個認識論視角，ANT反對批判實在論的本質化觀點，但同時也挑戰社會建構論中將「社會」視為「先驗」的概念（陳瑞麟 2010: 309）。它認為應當要質問的是「自然與社會如何共構」（co-produced）、世界的物質性如何在異質的位置、時刻與過程中被「做」出來，以及：

這些物質（社會、技術、紀錄、自然、人類、動物）如何在促成（enact）真實、知識以及其它所有一切的過程中，不斷轉變

與構成自身。(Law 2008: 632)

簡言之，並沒有一種先驗的存有，物質（自然、身體）與非物質（社會、論述、知識）皆是在實作中被促成、形塑、轉譯而共構而出。因此，結構、論述與身體，都不再是「唯一的」、「基本的發動者」（prime-mover），而是作為眾多的異質行動者之一，在特定的脈絡下，共同促成而形成不穩定與流動的「事實」（Law 2007）。同時，結構、論述、身體與「社會」本身也是此不穩定的網絡的暫時效果，是偶發的、暫時的「展演」（performativity）（Law 2008: 634）。

在知識論的定位上，ANT可稱為是後結構主義的延伸。與批判實在論的「物質—身體」（material-corporeality）取向不同，ANT的觀點是「物質—符號學」（material-semiotics）取向。一方面，它借用了結構語言學的「展演」的概念，類似於Judith Butler所說的「言說行動」（speech act），強調論述的引述力（citationality）與其產生的效果（Butler 1993; Law 2008; 林文源 2006），從而反對了批判實在論的「生物本質性」，認為「物質身體」也是在行動者的網路中的相對效果（relational effects）；另一方面，也把對實在論的批判用在建構論上，強調了物質本身仍是作為一個行動者的存在。在此理論下，生物身體與自然並非不存在，而是如社會範疇一般，皆非先驗的存在。

於此，尚需區辨Crossley所提到的二元「互動網絡」（身體與社會的互動）與ANT所提到的「行動者網絡」之間的不同。ANT的展演概念並非Goffman（humanist式的）觀點下的「表演」——總是有個先驗的「自我」；相反，ANT認為，行動者是異質網絡產生的效果，因此存有本身是在特定時空中被徵召、聚合而成。若傳統的社會學將「社會」概念視為解釋的來源，則ANT認為「社會」（或各種的「基礎」之範疇）

本身是需要被檢驗的；社會是作為一種「效果」而存在，而非最終的解釋基礎（Law 2007）。更抽象來講，ANT是將認識論與本體論問題放在同一個層次上思考，而批判實在論者是要區分認識論與存有論，並尋求一個先驗的存有作為基礎。因此，代表批判實在論的Crossley所提到的「身體與社會的互動」觀點，是兩個先驗存有之間的互動，不論其互動如何，並不影響其本體論上的存在意義；相反，ANT的「網絡」概念，卻在認識論上挑戰了其本體論上的存在地位，從而將本體論與認識論消融在一起。⁵

從ANT的角度來看批判實在論的肥胖分析架構，會認為Crossley忽略了能量比「如何」成為「科學事實」的問題，並且太容易的與主流科學政治態度一致的「視肥胖為疾病」。另外，批判實在論者雖說明了生物與社會「互動」，但無論其如何「互動」，自然／身體如何「獨立生存」於社會之外這件事，仍然沒有被解釋。而對立於批判實在論的「醫療化」與「能量比作為典範」的社會建構論，則同樣把論述與社會「本體論化」，成為先驗的行動者，視肥胖身體為論述或結構形塑而成的效果，「身體的經驗」本身卻成了一種「非身體／物質的存在」。

總結來說，ANT並不認為自己是「社會建構論」，他們並非只著重於分析「社會」的單一因素，而是將「社會」的概念也解離，討論任何

⁵ 另外，與Crossley一樣源自於象徵互動學派的社會世界理論（the social worlds theory）也值得一提。社會世界理論探討的是複數的社會世界各部分的組成與改變，以及在不同情境中，盡可能列出社會世界中的關係，如何形塑科技。Clarke與Star（2008）指出，一個新的社會世界理論強調的是Haraway的「情境的分析」，以扎根理論為基礎，結合論述分析與情境分析的方法，是一種「後現代的轉向」。而在此轉向中，認識論與存有論兩者亦是共同組成（co-constitutive, make each other up）。在這一個新的社會世界理論取向上，ANT理論與社會世界理論在認識論與存有論上的差異逐漸變小。

行動者的變遷與穩定性的問題（林文源 2006）。當然，ANT也不是實在論者，雖然兩者皆同意物質是作為「行動者」的存在。與ANT相近的科技女性主義學者Haraway（1991）就指出，「生物學是一種論述，而非現存活生生的世界」；在語言或論述之外不可能瞭解身體，但這也不表示語言形成了身體。身體的產生是動態的存在於知識對象中，如果世界的存在被我們視為「自然」，那是因為：

在科學地具體化以及其它形式中，自然是被做出的，但不是都被人類做出；它是在人類與非人類之中被共同建構而出的。

（Haraway 1991: 298）

Haraway所說的共同建構，也就是ANT提到的，在網絡中促成的（enacting）、具有複雜形構（complex configuration）的身體。因此，肥胖症的概念或者「能量比」並非單純基於生物學身體的基礎，而是促成與中介的社會過程。

那麼，ANT將如何看待肥胖議題？雖然ANT並沒有直接的分析，但曾透過低血糖症與糖尿病患的研究，分析促成的身體，很值得我們借鏡來看待肥胖的身體生物／社會關係。

Mol and Law（2004）在分析低血糖的糖尿病病患時，先不去爭論「身體到底是什麼」，而直接採取了實作（practice）的角度來看待身體，並試圖提出此方法論的視角所能帶出的新觀點。他們認為，從實作來看待糖尿病患者在面對隨時出現的低血糖（hypoglycaemia）症狀時，我們看到的是各式複雜的「行動」（acts）：測量（取血、讀取、發現）、感受（盜汗、顫抖）、對抗（進食、打針）、避免（恐懼、昏迷、死亡）。諸多行動共同「作成」了「低血糖症」（Done in all these

ways, hypoglycaemia is all these things) (Mol and Law 2004: 50)。

而此時身體到底是什麼呢？是當代醫學知識定義下一個「穩定、具有邊界」且「具有深度空間而疾病深藏其中」的生物學身體嗎？他們認為，身體於此過程中連結了更為複雜的器官（與感官）的行動：眼睛觀察、手部觸摸、嘴部進食、內臟與細胞消化代謝；進一步的也連結了外部的器物：藥瓶、設備、食物、環境空間安排；更連結了其他人的身體感受，例如病患的家人經常非常奇妙的可以直接「感覺」到病患的情緒，提醒她可能血糖太低。另外，「糖尿病患者」的行動並非僅連結於血糖的控制，他們還可能連結到「氣喘、眼盲、減重」等行動，而這不同的「行動」可能與糖尿病具有緊張關係（tension）。當然，不論是這些行動、外部器物、相關的疾病、與內外身體的感受，皆與特定的醫療論述緊密結合，這些醫療論述可能是臨床醫生的觀點、教科書的疾病說明、與病友之間相互學習的醫學認識。

從這個網絡連結的角度出發，身體不僅僅是包含了（incorporate）外在的事物，同時甚至出現了外延（ex-corporate）效果。這意味著：身體並非「具有固定邊界的整體」，相反的，其邊界具有「半滲透性」（semi-permeable）的意義。為了活下來，低血糖病患必須要去行動，去感受、測量、吃東西來應付血糖與相關的疾病問題，雖然別人無法取代病患，但是他們自身卻在實作中與周遭環境的共同促成了自己的存在。

Mol and Law因此結論說，如果我們不斷的把實作提到前景來，我們將會改變對身體的看法，此時的身體是一種非靜態、時時處於緊張中的「行動身體」（body-in-action），是諸多異質促成的產物。更進一步說，有諸多不同的方式促成出多樣的身體：肥胖身體、氣喘身體、瑜伽身體、跨性身體、運動身體……等等的複數身體，且並非不能重疊。依此，他們結論道：西方傳統理論下的「孤立而整體的身體」不見

了；但也不是說此時身體是「片斷的」（fragmented），而是指出身體作為一種複雜型態（complex configuration）的存在，得看在什麼網絡下、如何促成的方式而定。Mol在丹麥減重與飲食的研究中間到不同減重勸說如何促動複數的身體與食物／物質。她指出，節食身體是在食物的慾望與節制、減重技術（dietary technique）、能量比計算、營養科學、健康觀念各種型態中促成的。身體會具體化不同的「存有規範」（ontonorm）：在「小心你的餐盤」與「享受食物」兩種矛盾論述中，身體有時被動態的「教養」成不可過度飲食、保持計算卡路里、但有時也會轉成鼓勵有條件的享受食物；而在減重勸告論述，食物的意義變成了能量的來源、營養科學、健康觀念、慾望等（Mol 2013）。

除此之外，代表ANT的本土研究，林文源（2006）則提出「漂移之作本體論」來分析血液透析病患的行動與實作。文中指出，洗腎病患的身體存在，就是一種中介與漂移的過程。透析病患並非是單純的生物學身體附加上洗腎機器，或者病患身體並非只是「進入」某種醫療環境（或如Crossley所說的「身體」與「社會」的「互動」關係）。而是，洗腎病患的存在是透過導管、洗腎儀器、針頭、人工腎臟、醫生護士或病友會等的中介而存在，這些行動網絡的介入，使得透析病患的存在被不斷的轉換與重新導向。而也就是在這種變動的基礎上，生物性身體邊界對社會環境本身並非兩種存在，而是互相開放的。

從這個立場上出發，ANT批判並建議當代醫療必須要看到如此「活著的身體」，提供更為寬廣的診斷、更多元的介入身體的方式，更與日常身體實踐契合的治療。再者，他們倒不認為自己提供了最終的身體理論，反而自認所能貢獻的不過是把身體行動化、去本質化、複數化、去穩定化。

那麼如何以ANT的異質網絡與複數性（multiplicity）的觀點來看待「肥胖」議題？若以「做出一個肥胖病人」為分析的核心，不斷的將實作置於前景，將不會侷限於獨立的生物個體身上，而是將「病人」同時連結到眾多異質行動者的複雜網絡之中。要「作出肥胖症病人」，牽涉到作為一種肥胖醫療知識的「能量比學說」——源自於過去科學管理思潮（卡路里計算、都市管理與工業效能等相關論述的浮現），如何逐漸成為當代肥胖醫療知識的核心組成。而受此學說影響，醫生用以診斷病因，營養學家則計算卡路里，人們進行著各種測量、禁食、細嚼慢嚥、運動、服藥、手術……等行動，這些行動又依賴於體重計、跑步機、體脂肪量表、手機App等科技物，肥胖經由這些科技物的網絡而成形。肥胖者的日常生活實作可能是在掩飾她的臀部而尋找特殊衣服設計，使自己看起來接近「正常尺寸」。延伸來看，這個網絡中牽涉到其它眾多行動者的利益：藥廠、健身器材廠商、程式開發者、食品工業、……等。可能是這些眾多「物質」與「非物質」的行動者所組成的特定網絡下，共同做成了肥胖症病人。

但這並非是唯一的網絡，行動者也不僅只有這些，上述的描述也非唯一的答案。肥胖也可能存在於女性自我認同的核心之中，形成女性內化父權想像的自我監視，或是抵抗的行動策略（不管是否是潛意識的）。肥胖也可能是在台灣1990年代，想要逃避兵役的年輕男性對於軍隊抵抗計畫的一部分。當役男採取減重或吃胖不當兵的時候，能量比計算會成為減重計畫的重點，此時，流行病學對於肥胖等於不健康的警告，就會因為逃避兵役而「暫時」不被採納。當太多役男減重不當兵，國家也會以更動BMI標準與軍隊政策來改變其治理方式……。簡言之，從ANT的角度來說，世界上不可能僅止於一種身體、一種肥胖。複數化（與複雜化）肥胖之後，ANT將有助於對於「多樣肥胖」形成過程的理

解，乃至於幫助我們提出恰當的身體介入方案。

五、結論

本文主要透過肥胖議題探討批判實在論、社會建構論與行動者網絡理論對於「身體與社會」的不同觀點，以及這些觀點背後所代表的存有論與認識論的差異。具體的切入案例則以Crossley所提出的「肥胖是社會事實」的觀點，與建構論學者的「肥胖疾病的社會建構」做一對話，並且在最後以ANT的視角試著勾勒出肥胖研究的多樣可能。以下將評論這三個取徑之間的理論觀點、分析差異與政治，以及這個討論所能帶給我們什麼樣的啟發。

如同上述，批判實在論的觀點強調了世界真實存在於人們的論述形構之外，並指出建構論者經常把客觀的事實與論述混淆在一起，無法掌握認識論與存有論之間的區別，因此，批評建構論者經常以一種「解構別人意圖」的方式呈現自己的看法，但卻缺乏任何可以安立之基礎以及由此而來的政治介入。以肥胖議題來看，批判實在論認為這是來自於身體的生物事實與社會事實之間的互動，身體的能量因為社會生活方式變遷產生了改變，進一步導致了肥胖比率的上升形成了疾病，當代社會必須理解這個生活方式在身體層次上所帶來的影響，而且每個人必須能夠自我察覺並採取適當的行動加以改變。

而從建構論的角度出發，可以在醫療化與典範變遷的脈絡下來理解「肥胖的社會事實」。一方面，肥胖與疾病（或死亡率）的關係具有高度的科學不確定性，而肥胖標準的設立與改變，經常關聯到特定經濟力量的介入；另一方面，分析「能量比」的說法，顯示了它本身並非是個獨立於其他論述之外的「生物機制」，而是某種現代機械式身體觀典範

的一部分。從建構論者角度來看，Crossley的批判實在論的分析架構，乃是基礎於「生物學身體」的律則上，忽略了科學知識之社會建構性。在某個意義上，因為其生物學內在的普遍主義預設，也以特別的方式「再政治化」了「肥胖作為一種病態」。實在論者正尋找如何改變當代人們肥胖症的解答，建構論者卻指責實在論者本身就是「肥胖醫療化論述」的一部分。

ANT則是會將生物與社會的二元對立解除，並且將兩者都不視為獨立「存在」，而是檢視「身體／生物／物質」與「社會／文化／論述」兩者在實作、轉化與漂移過程中，如何作為行動者的存在。換言之，從ANT的角度來看，無論是批判實在論或是社會建構論，其實要不是「本體論化」(ontologized)了生物／物質／身體範疇，便是社會／論述／文化範疇。而現實上，所謂「本體」存在於高度不穩定、異質、且複雜多重的網絡之中，以Latour的話來說，這是一種「行動本體論」(Latour 2012；林文源 2012)。準此，「能量比」並非先存的生物機制，社會結構也非先驗的存在，文化論述更不是最終的解釋；生物身體、社會結構、文化論述皆是在異質的社會行動網絡中發生，透過促成、展演而轉為「事實」與不同的「肥胖」主體。

而上述這三者的不同取徑實際上有著不同的政治想像。一位可以歸類於建構論的STS女性主義者Oudshoorn指出：

從女性主義學者那裡，我採用了知識上具有挑戰性與政治上相關的概念，沒有非媒介的身體自然事實是存在的。身體永遠是一種意義化的身體 (signified body)。我們對於身體的感知與詮釋永遠是透過語言來媒介，在我們的社會，生物醫學科學的功能就是作為這個語言的主要提供者。這種觀點的知識是連

結到對於生物醫學知識的狀況的批判與再評價。(Oudshoorn 2001: 201)

此段文字固然清楚的表達了她的建構論立場，但真正關鍵的詞彙則是「知識／政治的意義」。延伸來說，社會建構論批判「肥胖事實」的根本原因，是企圖指出肥胖科學知識與實踐，對當代身體（特別是女性）的諸多控制：透過持續的醫療「防治」與「矯正」，加諸於「病態身體」與其「人格」上無所不在的污名。選擇知識與論述的批判作為一種抵抗的策略，正是社會建構論者所欲提供的政治方向。這個政治方向固然被批評為「不可知論者」，然則它的確能夠藉由與主流論述與知識型態保持距離，從而挖掘出論述中所隱含的權力關係。

而批判實在論立論的核心，則是針對社會建構論取消了身體的施為者地位，視身體為符碼所穿透的主體，忽略了身體所具有的各種感受經驗；若此，社會學知識將無法面對現實狀況，這如同是「自我邊緣化的退卻」。他們會認為，對當代日常生活世界的批判，特別是對當代生活方式與疾病的積極介入，正當是社會學重要的政治方向，而建構論立場正與此目標背道而馳。

而從ANT的角度來思考，實在論與建構論的取向同樣都代表了一種內在於現代性的「純粹化」現象世界的企圖：存在著一個最終解釋之存有。ANT對「純粹化」（或對「現代性」）的批判，正在於將我們自身置於真正的「複雜、變動的多樣現實之內」；由此出發，不去單一化、片面化、浪漫化（乃至於可能的「暴力化」）任何的政治方略，方有可能透過更豐富的理解，開展出在地、適當的行動策略。亦即，在異質行動者於特定時空形成的網絡之中，我們確然失去了穩定的主體作為任何政治意圖之基石；然則，這正是我們開展出深思熟慮的實踐的機會（林

文源 2012)。但這不是說，ANT是社會與身體議題上最完美的解釋，或者它高於批判實在論與社會建構論；而只是說ANT豐富我們一個多維的思考空間。

藉由耙梳三個取徑，本文認為若肥胖的議題不落入實在論與建構論的兩大陣營之中，而將之當成是諸多異質網絡交織出來的存在現象，反而可以更從容的理解它在不同網絡位置上所產生的特定效果，看到肥胖症身體的存有本身的社會中介過程與特定的意義。以ANT的研究方式，我們可以選擇與建構論一樣關心「偏差身體的政治性」，指出諸多的「醫療防治矯正」正促成了「一種被污名化的病態身體」，但不必將社會或論述視為是唯一的行動者；我們也可以共享批判實在論介入當代社會生活的關懷，認真面對肥胖症與減重實作過程中可能帶來的諸多問題，而不必去敵視論述的力量。亦即，我們——作為諸多行動者之一的自身，有可能因為核心關懷的差異，在不同的實踐位置上，將「肥胖」置於特定的異質行動者網絡之中加以理解，產生更具意義的轉化。

最後，作為一個本土身體社會學、醫療社會學、女性主義等研究的反思，我認為藉由耙梳西方身體社會學研究中批判實在論、社會建構論與ANT取徑之間的相互辯論，可以提供研究者對於「身體vs.社會」這組難題一個有用的理論架構，並可以幫助我們覺察自身所選擇的存有論與認識論立場，以及由此延伸出的方法與分析觀點，最重要的是，也有助於我們深刻理解自身政治關懷與可能的實踐方式。

作者簡介

鄭斐文，東海大學社會系助理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性別研究、文化研究、科學、技術與社會、視覺文化等。近幾年研究興趣主要以身體社會學、性別、科技與醫療為主。

參考書目

- 林文源，2006，〈漂移之作本體論〉。《台灣社會學》12: 69-140。
- ，2012，〈導讀〉。頁25-56，收錄於布魯諾·拉圖（Bruno Latour）著、余曉嵐、林文源、許全義譯，《我們從未現代過》。台北：群學。
- 吳嘉苓，1999，〈性別、醫學與權力〉。頁385-418，收錄於王雅各編，《性屬關係》。台北：心理出版社。
- ，2009，〈科技、社會與風險〉。頁523-550，收錄於王振寰、瞿海源編，《社會學與台灣社會》。台北：巨流。
- 陳瑞麟，2010，《科學哲學：理論與歷史》。台北：群學。
- 許甘霖、王思欣，2006，〈肥胖與減重問題：醫療化與商品化交織發展的過程〉。頁222-227，收錄於《台灣醫療四百年》。經典雜誌社。
- 鄭斐文，2012，〈肥胖科學、醫療化與身體政治〉。《科技、醫療與社會》（*Taiwanese Journal For Studies of Science, Technology and Medicine*）14: 73-140。
- Baert, Patrick著、何昭群譯，2011，《社會科學哲學：邁向實用主義》。台北：群學。（Baert, Patrick, 2005, *Philosophy of the Social Sciences: Towards Pragmatism*. AL: Blackwell Pub.）
- Latour, Bruno著、余曉嵐、林文源、許全義譯，2012，《我們從未現代過》。台北：群學。（Latour, Bruno, 1991, *Nous N'Avons Jamais Eté Moderns*. Paris: Socio Publishing.）
- Shell, Ellen Ruppel著、陳宏淑譯，2004，《飢餓的基因》。台北：正中。（Shell, Ellen Ruppel, 2002, *The Hungry Gene: The Science of Fat*

and the Future of Thin. New York: Atlantic Monthly Press.)

Sismondo, Sergio著，林宗德譯，2007，〈科學與技術研究導論〉。台北：群學。（Sismondo, Sergio, 2003, *An Introduction to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 London: Blackwell.）

Turner, Bryan S.著，謝明珊譯，2010，〈身體與社會理論〉。台北：韋伯文化。（Turner, Bryan S., 2008, *The Body and Society: Explorations in Social Theory*, 3rd ed. London: Sage.）

Vogel, Shawna著，魏淑玲、王紹婷譯，2001，〈脂肪迷思〉。台北：新新聞文化。（Vogel, Shawna, 1999, *The Skinny on Fat*. New York: Freeman and company.）

Woodward, Kathryn著，林文琪譯，2004，〈身體認同：同一與差異〉。台北：韋伯。（Woodward, Kathryn, 1997, *Identity and Difference*. London: Sage.）

Bordo, Susan, 1995, *The Unbearable Weight: Feminism, Western Culture and the Body*. London: California.

Butler, Judith. 1993, *Bodies That Matter: On the Discursive Limits of "Sex"*. London: Routledge.

Campos, Paul, 2004, *The Obesity Myth: Why America's Obsession With Weight is Hazardous to Your Health*. New York: Gotham Books.

Chang, Virginia W. and Christakis, N. A., 2002, "Medical Modeling of Obesity: A Transition From Action to Experience in A 20th Century American Medical Textbook." *Sociology of Health & Illness* 2(2): 151-177.

Chernin, Kim, 1981, *The Obsession: Reflections on the Tyranny of Slenderness*.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 Clarke, Adele E. and Olesen, Virginia, 1999, "Revising, Diffracting, Acting." Pp. 3-48 in *Revisioning Women, Health and Healing: Feminist, Cultural, and Technoscience Perspectives*, edited by Adele. E. Clarke and V.L. Olesen. London: Routledge.
- Clarke, Adele E. and Star, Susan L., 2008, "The Social Worlds Framework: A Theory/Methods Package." Pp. 113-137 in *The Handbook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 eds. by Edward J. Hackett, Olga Amsterdamska, Michael Lynch and Judy Wajcman. London: the MIT Press.
- Clarke, Adele E., Mamo, L., Fosket, JR., Fishman, JR., Shim, JK., 2010, *Biomedicalization: Technoscience, Health, and Illness in the U.S.*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 Crawford, Robert, 1994, "The Boundaries of the Self and the Unhealthy Other: Reflections on Health, Culture and AIDS." *Social Science and Medicine* 38(10): 1347-65.
- Crossley, Nick, 1997, Corporeality and Communicative Action: Embodying the Renewal of Critical Theory. *Body and Society* 3(1): 17-46.
- , 2004, "Fat is A Sociological Issue: Obesity Rates in Late Modern, "Body-Conscious" Societies." *Social Theory & Health* 2: 222-253.
- Evans, Bethan and Colls, Rachel, 2009, "Measuring Fatness, Governing Bodies: the Spatialities of the Body Mass Index (BMI) in Anti-Obesity Politics." *Antipode* 41(5): 1051-1083.
- Foucault, Michel, 1982/1997, "Technologies of the Self." In *Michel Foucault: Essential Works of Foucault 1954-1984 Vol. 1*, edited by Robert Hurley, James D. Faubion, and Paul Rabinow. London: Routledge.
- Gaesser, Glenn A., 2002, *Big Fat Lies: the Truth About Your Weight and Your*

Health. Carlsbad: Gurze Book.

Gard, Michael and Wright, Jan, 2005, *The Obesity Epidemic: Science, Morality and Ideology*. London: Routledge.

Gilman, Sander, 2004, *Fat Boys: A Slim Book*. Londo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Giddens, Anthony, 1991, *Modernity and Self-Identity: Self and Society in the Late Modern Age*.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Haraway, Donna, 1991, *Simians, Cyborgs, and Women: The Reinvention of Nature*. London: Free Association Books.

Law, John, 2007, "Actor Network Theory and Material Semiotics." Version of 25th April 2007, available at <http://www.heterogeneities.net/publications/Law2007ANTandMaterialSemiotics.pdf>(downloaded on 18th May, 2007)

——, 2008, "On Sociology and STS." *The Sociological Review* 56(4): 623-648.

Mol, Annemarie and Law, John, 2004, "Embodied Action, Enacted Bodies: the Example of Hypoglycaemia." *The Body and Society* 10(2-3): 43-62.(<http://www.heterogeneities.net/publications/MolLaw2004EmbodiedAction.pdf>)

Mol, Annemarie, 2013, "Mind Your Plate! The Ontonorms of Dutch Dieting."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43(3): 379-396.

Monaghan, Lee F., 2008, *Men and the War on Obesity: A Sociological Stud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Newton, Tim, 2007, *Nature and Sociology*. London: Routledge.

Oliver, Eric, 2006, *Fat Politics: the Real Story Behind America's Obesity*

Epidemic. Oxford: Oxford.

Orbach, Susie, 1978, *Fat is A Feminist Issue: How to Lose Weight Permanently Without Dieting*. Middlesex: Hamlyn Paperbacks.

Oudshoorn, Nelly, 2001, "On Bodies, Technologies and Feminisms." Pp. 199-213 in *Feminism in Twentieth-Century Science, Technology, and Medicine*, edited by Creager, Angela N. H., Lunbeck, Elizabeth & Schiebinger, L..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eterson, Alan and Lupton, Deborah, 1996, *The New Public Health: Health and Self in the Age of Risk*. London: Sage.

Rich, Emma and Evans, John, 2005, "Fat Ethics'- The Obesity Discourse and Body Politics." *Social Theory & Health* 3: 341-358.

Ross, Bruce, 2005, "Fat or Fiction: Weighing the 'Obesity Epidemic'." Pp. 86-106 in *The Obesity Epidemic*, edited by Michael Gard and Jan Wright. London: Routledge.

Sayer, Andrew, 2000, *Realism and Social Science*. London: Sage.

Schwartz, Hillel, 1986, *Never Satisfied: A Cultural History of Diets, Fantasies and Fat*.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Shilling, Chris, 2003, *The Body and Social Theory*. London: Sage.

Sobal, Jeffery, 1995, "The Medicalization and Demedicalization of Obesity." Pp. 67-90 in *Eating and Agendas: Food and Nutrition as Social Problems*, eds. by Donna Maurer and Jeffrey Sobal. New York: Aldine De Gruyter.

Williams, Simon J. and Bendelow, Gillian A., 1998, *The Lived Body: Sociological Themes, Embodied Issues*. London: Routledge.

Williams, Simon J., Birke, Lynda and Bendelow, Gillian A., 2003,

“Introduction: Debating Biology.” Pp. 1-12 in *Debating Biology: Sociological Reflections on Helath, Medicine and Social*. London: Routledge.

Williams, Simon J., 2003, “Beyond Meaning, Discourse and the Empirical World: Critical Realist Reflections on Health.” *Social Theory and Health* 1: 42-71.

——, 2006, “Medical Sociology and the Biological Body: Where are We Now and Where Do We Go from Here?” *Health: An Interdisciplinary Journal For the Social Study of Health, Illness and Medicine* 10(1): 5-30.